

清未来华的西方博物学者在华北与华南科学实作的差异

香港中文大学 HIST-5507 作者：蒋宇恒

摘要： 19 世纪，许多西方博物学者来到中国，他们通过田野考察、商品贸易等形式同中国人展开博物学交流，获取了丰富的研究素材。然而，这些西方人在华南和华北地区的科学实作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西方人同华北当地民众的关系上，这也使得他们没有能在华北地区树立起科学权威，并建立范发迪所说的“知识帝国”。并且西方人在华北考察的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他们的传教士身份；同时这一身份也限制了他们后期在华北地区考察的深入。

关键词： 博物学；华北史；传教士；范发迪；近代中国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 China and South China in scientific practice of Western naturalists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T-5507

Author: Jiang Yuheng

Abstract : In the 19th century, many Western naturalists came to China. They conducted natural history exchanges with the Chinese through field trips, market trade, etc., and obtained rich research material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cientific practices of these Westerners in South China and North China. This difference is reflec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ers and the local Chinese people in North China. As a result, they have not established scientific authority in North China and established what Fa-ti Fan called an "Knowledge Empire." Moreove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Westerners' inspections in North China largely relied on their status as missionari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atus also limited the depth of their later inspections in North China.

Keywords: na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North China, missionary, Fa-ti Fan, modern China

一、引言

作为科学四大传统之一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又作“自然志”），是一门包含了

对大自然的观察、采集、分类、整理与描述的科学。^①华夏大地，最早的朴素博物学实作可追溯至李时珍、徐霞客等古代科考旅行者，以及将地方性知识应用于农业、医药、园林设计等领域的劳动者。而西方科学语境下的帝国型博物学，则是自十八世纪才开始传入。彼时，西方商人、传教士、博物学家来到中国，在田野考察之余，将许多本土物种带去了欧洲，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博物学传统。

美国学者范发迪 (Fa-ti Fan, 下称范发迪) 在其著作《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详细描述过当时英国人在华南地区的情况。^②范发迪认为，西方来华的博物学者在广州等地，通过贸易、雇佣、外交等“文化遭遇” (cultural encounter) ^③的形式，同当地人进行博物学交互。西方人在获取博物学材料的同时，也通过这一过程对中国人实现“规训”，将科学权力隐藏在经济、贸易等非科学手段背后，树立起科学的文化权威，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帝国”。^④

范发迪的研究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后殖民主义色彩。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博物学，本是一个不同国家学者与中国民众在清朝疆域这一独特的自然环境内，多方面互动的场所。而范发迪的研究只关注了英国学者及华南地区，忽视了其他国家的活动、不同学者的不同经历，以及地区差异性 etc 对其论述不利的史料。

事实上，清未来华的西方博物学者在华南与华北地区的科学实作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不论是那些来访者的记述还是相关的历史资料，也都以华南居多。那些西方人在华北考察时所遭遇的困难和阻碍也多于华南，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在华北地区构建起一个如范发迪论述那样的“知识帝国”。一些学者将这一原因归结为清政府的集权管控导致西方人在华北的活动范围受限，或是总结为华北民众对于洋人的敌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些历史细节。

博物学为学者研究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以及探索中国本土的地区差异性提供了全新视角。学者罗桂环在其著作《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详细介绍了从明晚期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西方学者在我国进行博物学考察、物种收集和研究的状况。^⑤

① 刘华杰：《博物复兴与未来生态文明》，《文明》，2023年3月，第8-9页

②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导言1-8页

③ “文化冲突预设了两个或多个文化，彼此界限分明，互不相容；当他们相遇时，即如石头或台球碰撞，铿锵对立。文化遭遇并没有这种含义。它凸显的是文化的多元性、活力性与弹性，注意文化相遇时的过程及其多种可能的结果。”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文版序第4页

④ 关于帝国的科学实作与其背后权力，本文不作讨论，详可参考笔者文章。蒋宇恒：《清代英国博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科学实践背后的权力话语》，《西部学刊》，2023年10月上半月刊，第101-106页

⑤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第1版，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而学者范丽媛的论文《20 世纪上半叶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华博物学实践研究》则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以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又作索威比；下称苏柯仁）^①的考察经历为案例，探讨了博物学实践与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融合。^②较为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从地区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去探索、分析那些西方来华的博物学者在不同地域科学实作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

因此，本文以清未来华的西方博物学家在华北、华南的科学实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传教士、义和团运动等历史因素的影响，结合史料及相关文献，运用概述、总结、对比等方式，重点关注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又作谭微道、戴维、大卫；下称谭卫道）^③与苏柯仁等有代表性的学者，探究这些学者当时在华北、华南科学实作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本质与背后的影响因素。

正文将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笔者将以范发迪的研究为基础，概述清末西方博物学家在华南科学实作的特征；第二部分为本文的论述重点，笔者将结合西方博物学家在华北考察的具体案例，对比那些华南的特征在华北是否得以复现，并分析其原因；第三部分，笔者将结合华北地区史，从博物学者的社会角色出发，探究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

二、清末西方博物学者在华南考察的特征

西方博物学者在华南的科学实作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是重视同当地人的交互、其二是非正式手段的运用、其三则是帝国权力的彰显。

那些西方博物学者很重视“俗民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的运用，这点体现在他们同当地人的交互上。一方面，他们的田野考察需要与当地物种分布、采集方法、运输窍门等相关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通过雇佣的形式协助采集，也能帮助他们提高效率、节省时间。早期来华考察的学者，大多会雇佣当地人作为向导，带领他们去山中做一些采集工作，或是从手工业从业者口中了解相关原料和生产技艺。例如

^① 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英国博物学家，出生于山西太原，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后于 1905 年重回中国生活，曾在我国华北、西北、东北以及南方部分地区进行过博物学考察。范丽媛，韩琦：《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东北地区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231-245 页

^② 范丽媛：《20 世纪上半叶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华博物学实践研究》，山西大学，2023 年。

^③ 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法国动植物学家，天主教遣使会会士，曾在京津冀以及内蒙古一带做过博物学考察，亦深入过青藏高原边陲，是第一位系统探索远东地区的西方博物学者。Whittle, T., "The Plant Hunters", London: Heinemann, 1970. p.15

邱园 (Kew Gardens) 曾经委托过海南岛领事通过广西地区的商贩, 调查提炼樟脑油的方法, 并寻求制油的植物。^①其中的一些博物学者则会将采集工作全权委托给当地人, 如罗伯特·福琼 (Robert Fortune, 下称福琼) 曾雇佣多达几十名中国小孩帮其收集标本, 并声称: “这些小顽童很起作用。”^②范发迪对此论述道: “旅行博物学家能找到最好的收集工就是当地的村民, 因为他们比任何西方人都更了解当地动植物的习性和栖息地的情况。”^③这些西方人在华南地区, 有些时候甚至能以金钱或是洋货发动整个村子的人为其进行采集工作。

范发迪在其著作中提出“非正式帝国” (informal empire)^④这一概念, 并将所有参与了知识生产、审定、传播的人 (包括西方的科学从业者、使节、商人、传教士等博物学爱好者, 同时也包括那些本土的商人、画师以及参与协作的劳动者) 以及这一过程所涉及的知识和技术统称为“科学行动者” (scientific actors)^⑤, 目的是将那些传统的、社会层面的、非科学的因素对科学的影响, 也纳入科学史研究的范畴。19 世纪, 华南地区最早的博物学交互不是发生在田野而更多是在商埠, 从业者也更多是以商人的身份而不是博物学家。例如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 亚伯拉罕·休姆 (Abraham Hume) 就曾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通过贸易的形式从中国引进大量的菊花。^⑥同样, 作为东印度公司茶叶督察员的约翰·里夫斯 (John Reeves) 纵使语言不通, 也通过博物学图例的方式按图索骥, 搜集了许多重要植物^⑦, 并雇佣画师为其制图, 即绘制博物画。

这些西方人通过商品贸易、劳动雇佣这样的“文化遭遇”手段, 对中国博物学传统做出了“规训”。如植物的采集和对其性状理解, 以草本植物为例, 中国人早期的博物学传统是仅对其可以入药部分附以实用性描述, 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图例——只是将这些部分加以夸张、放大进行展现。西方人认为这种收集和分类方法一来不够客

① Kew, “Misc. Reports. ” 4.4. China. Economic Products. II. , ff. p.284-285, p.286-289, p.289-295

② 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Chinese: Ind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 From 1853 to 1856”, London: John Murray, 1856,60. p.97-98

③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第 186 页

④ 这一概念源自范发迪的, 指的是西方国家通过如中国海关、教会、商会这样非科学的权力机构, 建立起了社会网络, 用于知识的分析与收集, 因此是“非正式的”。蒋宇恒:《清代英国博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科学实践背后的权力话语》.

⑤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中文版序

⑥ Bretschneider, “History”. p.211-215

⑦ James Anderson, “Letters to Sir Joseph Banks, Baronet,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on the Subject of Cochineal Insects, Discovered at Madras, &c. &c.” Madras: Print by Charles Ford, 1788. p.24

观，不能满足其研究需求，二来也缺乏写实性和科学价值。因此，他们在商品交易时，会尽量挑选相对完整的货品，并且在要求中国画师为其作画时，责令其依据写实性需求做出修改。由此，西方人通过这样设立“门槛”的方式建立起了科学权威，改变了中国的博物学传统以及当时的博物画风格。^①

清末英国博物学家在华的科学实作，除了最朴素的田野工作——采集、分类以外，还包括上文论及的商品交易、动植物的远洋运输、博物画的视觉权威性，以及未能谈到的俗民知识与帝国权威、汉学与知识传译等多个方面；由此，西方人通过海关、政府、商会等权力机构，通过贸易、外交等非科学手段建立起的知识网络，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当时博物学知识的解释权，在清朝疆域上构建出一个“知识帝国”的形象。

然而，不论是那些西方人科学实作的方式，还是范发迪所谓“知识帝国”的建构，华北地区的情况都与其描述有所不同，笔者将重点关注那些在华北考察的西方人同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社会角色，结合华北地区史，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三、西方人与华北当地民众

华北地区由于地处丘陵，加之陕甘一带水土资源匮乏，其物种多样性势必略逊于华南。但这并不代表华北地区缺少博物学考察的价值或者是无法吸引那些西方学者。19世纪下半叶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就曾明确表示过对于华北地区生态的兴趣：

“考察中国本土的北部有着很大的科学价值……我们不能把这些考察工作让与他人，也不能让别人在亚洲这个地区超过我们。一方面，这是由于我国对中国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同时也是由于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西北边境天山一带业已着手进行的重要勘察。”^②

除此之外如上文提及的苏柯仁、谭卫道、福琼，以及俄国探险家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hewalski）、法国传教士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等人也都在华北留下过科学考察的足迹。那么这些人在华北地区的考察同华南有什么不同，华南的情况是否能在华北复现，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便是本节将讨论的内容。

1、苏柯仁的考察经历

^① 王钊：《中国古代博物学绘画》，《博物》，2017年第3期，第36-41页

^② [俄] 尼·费·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85-86页

学者苏柯仁在其著作中，记述了1908年初加入贝德福德伯爵探险队后的三段华北博物学考察经历。^①

第一段是从山西太原府向陕西延安府，途径汾州府、绥德州的旅程。这一路上，探险队仅招募了三名当地人随行，并且采集工作多为自己进行，随行当地人仅作为向导。^②探险队途径石狮岭和延水河谷，苏柯仁等人运用最朴素的博物学田野调查手段，即狩猎采集的方式——利用灌木丛制造陷阱，进行动物标本收集。探险队依凭经验，通过观察啮齿类动物食性的踪迹（如灌木丛的高低、被啃食的浆果等）发现了大量的小型动物，更是收获了鼠兔这一新的物种，以及硫腹鼠、大仓鼠以及野兔这三个啮齿类动物的新亚种。^③

第二段旅程从延安府出发，途径靖边县，前往陕西榆林府。起初，他们在没有当地人做向导的情况下攀登延河河谷到达靖边县，苏柯仁描述道：“这里极度沉闷与荒凉，当地居民也十分贫穷和可怜。”^④因此没有同当地人做过多的交流，而只是雇佣了一名本地人作为向导，引领他们徒过一段难走的沙丘。之后一行人到达内蒙古，想要借宿却屡遭到拒绝。次日，探险队路遇一名手持十字架的长者，长者误以为苏柯仁等人是天主教传教士，邀请他们去自己家留宿，而在知晓一行人并非传教士后又一改之前的态度，收回了邀请。探险队之后在当地捕获了少量松鼠、野兔、蜥蜴后再度启程。在停留期间，当地发生了婴儿和耕畜死亡的事件，一些本地人认为是洋人到来所遭致的灾祸，因此更无人充当向导，以至于一行人又在沙漠中迷失数日，最终以重金向当地一位农场主求助，才得以到达榆林府。^⑤

第三段则是从榆林府出发，途径保德州、宁武府，最终回到太原府的旅程。此次旅行，本计划经过鄂尔多斯沙漠，但在出发以前，苏柯仁已通过张榜告示的形式，向当地人悬赏野生动物，收获到了他们想要的动物标本，如跳鼠、沙鼠、刺猬等^⑥；故最终放弃了前往鄂尔多斯的计划。在张榜收集完成后，探险队又前往高地和沙漠，穿过高家堡、神木县、孤山堡和府谷县，沿途收集了大量啮齿类动物和蛇的标本，并在东寨镇狩猎，收集到了鼯鼠、花栗鼠、五趾跳鼠等罕见新物种，最终经过宁武府和大牛店，通过忻州返回了太原。

2、科学实作的同异比较

① [英] 苏柯仁著：《在中国的一个博物学的开拓者》，朱锦成译，《新科学》，1940年，第632页

②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Sport and Science on the Sino-Mongolian Frontier",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8. p.6

③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Sport and Science on the Sino-Mongolian Frontier". p.11

④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Sport and Science on the Sino-Mongolian Frontier". p.6

⑤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Sport and Science on the Sino-Mongolian Frontier". p.20-36

⑥ Arthur de C. Sowerby, A. M. Sowerby, J. E. Stone. "The Sowerby Saga", Washington, 1952. p.109

由苏柯仁的经历可以见得，即便是在华北地区，博物学者同当地人的交互依然十分频繁；在华北考察的西方人也会像那些在华南的同僚一样，雇佣本地人带领他们去到那些动物出没的地方，苏柯仁认为这种收集方式显得更为高效。^①

两地区的第一个不同点在于，苏柯仁等人在华北同当地人的交互是一种将雇佣和贸易结合的赎买方式；而华南地区的雇佣和贸易则是完全分离的。就雇佣关系而言，那些在华南地区旅居的博物学者通常会雇佣几个固定的当地人做长期向导，或者是做充当翻译员的贴身仆人，他们将其称之为“Boy”^②。故华南的受雇者较之华北地区，拥有更多的田野考察经验，甚至拥有更专业的采集手段和更高的忠诚度——他们知道那些西方人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虽然陕甘等地确实存在能够吸引西方人的珍稀物种，但正如苏柯仁所言，这些地方在当时过于沉闷和荒凉，以至于几乎没有学者或是考察团长期定居于此，加之当地人对外来者本身就有所忌惮，因此二者很难缔结长期的雇佣关系。当地人的采集活动对于那些学者而言只能说差强人意，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榆林府的张榜收集中，除了提及的那些物种外，苏柯仁实际还收得许多残缺、死去的动物，以及一些没有价值的动物皮。^③因为缺乏这种长期的雇佣关系，导致了西方人通过“文化遭遇”对当地人的“规训”变得更加困难，也很难撼动华北地区的博物学传统。

从商品贸易角度来看，华北地区也存在其独特性，这主要体现在华北地区的博物学贸易多以标本或是大宗商品为主。例如谭卫道在北京的皇家猎场发现了麋鹿，即“四不像”，谭卫道称其“大卫神父鹿”（Père David's deer）或是“谭卫道鹿”（David's deer），随后谭卫道通过外交手段，从一名清朝官员手中购得了一批活的麋鹿，并将其运往欧洲。^④

上文业已提及，在华南地区，最早的博物学交互更多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商埠。虽然在当时的华北地区，也存在如晋商这样活跃的商业群体与相对开放的市场^⑤，但出于18世纪遗留的“一口通商”政策限制，大部分西方人商业活动的范围还是聚集在广州一带，不论是晋商向俄国转卖货物还是将货物从华北送至广州粤海关，长途运输都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博物学家而言，这个问题就显得格外头疼，因为除了那些动植物图例、标本、博物画以外，包括邱园在内的西方科学机构或是博物学者，都对活体植株、活体动物

① [英] 苏柯仁著：《在中国的一个博物学的开拓者》，第632页。

② G. E. Morrison, "An Australian in China",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72, 50. p.58-60, p.89-91, p.115

③ Arthur de C. Sowerby, A. M. Sowerby, J. E. Stone. "The Sowerby Saga", Washington, 1952. p.110

④ David, A., "Fox, H. M., Biographical Sketch, from 'Abbe David's Di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xv xxxii.

⑤ 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历史学报》，1977年第5期，第281-292页

有着狂热的追求。^①

由此便延伸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运输本身，活体动植物的运输要比标本难得多，故成本也十分高昂。1833年第一株从中国运往欧洲的活体重瓣杜鹃花，其售价高达100英镑，更有园艺学会愿意出价250英镑。^②虽然在19世纪沃德箱（Warden case）已经被作为活体植物长途运输的工具投入使用，但因植物光合作用的需求，沃德箱必须外覆玻璃，这就使得这些植物在途径山东等山地时格外容易损坏或佚失。^③其二是俗民知识，中国幅员辽阔，北方和南方气候差异较大，因此沿途需要对那些对温度较敏感的植物做特殊处理，这就要求随行者对这些植物的性状、以及南北的温度、气候都有所了解^④，同时那些西方人在南方习得的俗民知识到了北方会变得不适用，倘若沿途雇佣当地人，又会面临因南北方言差异导致的沟通不畅问题。^⑤在种种问题困扰之下，为了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并取得收益最大化，那些西方人在华北的博物学贸易才都选择便于运输的标本，或者是科学研究价值较大的大宗商品。

四、西方博物学者的社会角色

19世纪西方博物学者留下的关于华北地区相关的记述以及史料确实要少于华南地区^⑥，这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鸦片战争以前，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活动范围都十分有限^⑦，如约翰·利文斯通（John Livingstone）、托马斯·比尔（Thomas Beale）等人只能到达沿海的广州、澳门、厦门以及北京等地^⑧，除部分俄国人以外^⑨，几乎没有欧洲人可以在华北地区自由活动、进行博物学实作，故早期在华北地区活跃的博物学家多以依托传道团的俄国人为主。尽管如此，也有一些西方博物学者通过特殊身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行考察，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曾于1816年将特派的园艺师安插进阿美士

①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27-33页

② Kew,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53 (87).

③ 黄相辅：《温室、透镜与水晶宫：19世纪科学中的玻璃》，《科学月刊》，2021年第616期。

④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40-45页

⑤ 高清青：《论南北方言差异》，《汉字文化》，2022年第11期。第25-26页

⑥ 具体可参考如 Jane Camerini, "Remains of the Day: Early Victorians in the Field", in Lightman, ed., *Victorian Science in Context*. p.354-377; Alex Soojung-Kim Pang, "The Social Event of the Season: Solar Eclipse Expeditions and Victorian Culture", *Isis* 84, 1993. p.252-277

⑦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第15页

⑧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23页

⑨ 李齐芳：《中俄关系史》，第1版，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年。第77页

德 (William Pitt Amberst) 的访华使团中。^①其中, 克拉克·埃布尔 (Clarke Abel) 根据本次考察的经历撰写了关于中国园艺的著作。^②由此可见, 彼时西方人已然知晓, 可以通过取得一些特殊的社会角色或是社会关系, 获得一些特权, 为其在华北的考察提供便利。

到了 19 世纪中期, 鸦片战争之后, 大量沿海的港口在条约之下被迫开放, 西方人也获得了在华北等许多地方自由行动的权力。这段时期, 需要关注的社会角色仍然是传教士。1842 年《南京条约》规定了传教士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的口岸区域活动, 此后, 1860 年的《北京条约》又规定了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对比鸦片战争后华南地区涌现的一批如福琼这样以商人角色活动的博物学者, 华北地区活跃的博物学者都或多或少同当地领事或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 或者其本身就担任这一职位。^③

上文提及的博物学者谭卫道, 本是巴黎的一名天主教神父, 于 1861 年被派遣到中国的教会学校进行传教^④, 得益于其传教士身份, 谭卫道早期在华北一带的活动不受限制, 因此才得以开展一系列的博物学考察。与谭卫道同时期、拥有博物学成就的传教士还包括贝类学家韩伯碌 (Pierre Heude) 以及植物采集者赖神甫 (Jean Marie Delavay)。^⑤

一方面, 这些天主教传教士长期得到欧洲政府的支持, 政府和博物馆为他们支付医疗、法律、交通等一切开支^⑥; 因此他们无需通过华南商埠中的那种商品贸易赚取资金, 故能在博物学考察和研究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 这些传教士长期在华北居住, 有的甚至待了数十年; 他们通过教会、信众以及同当地政府的联系, 建立并维持着广阔的社会网络; 他们的起居衣着也与当地人类似, 在传教过程中同当地人交流, 也逐渐熟悉了华北地区的方言以及传统文化。^⑦除此以外, 19 世纪 70 年代华北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旱灾, 那些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 通过赈灾、救济等方式积累

① [英]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 刘天路, 刘甜甜译, 第 1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② Clarke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816-1817", London: Longman and Hurst, 1818.

③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 第 24 页

④ Vincentians, "Annal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Paris: Rue de Sevres, 1936.

⑤ Bretschneider, "History". p.824-929

⑥ 朱昱海:《法国来华博物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 年第 4 期. 第 102-128 页

⑦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第 102 页

了一定的口碑，甚至为此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①因此，正如上文所述苏柯仁在第二段考察中遭遇当地长者的经历，传教士身份确实给当时在内地考察的西方博物学者带来了诸多便利。

相较于商人而言，传教士群体在博物学上的建树普遍更大。范发迪认为，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商人群体本身对博物学兴趣不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商人群体为了追求商业机会，不得不住在沿海通商口岸这样的大城市；正因如此，以商业为导向的华南地区博物学会牵扯到更多利益相关的因素。^②而传教士本身没有什么个人利益的牵连，大多是凭借对旅行或者对自然的兴趣开展研究。如 1855 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韦廉臣 (A. Williamson) 就曾在任职期间，在山东烟台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采集过 180 种经济植物，并将其送至爱丁堡植物园。^③在 19 世纪末又涌现了如黎桑 (E. Licent)、德日进 (P. Teilhard de Charlin) 等在黄河流域以及西北一带传教，并沿途进行生态考察的博物学者，本文不再赘述。^④

传教士身份在给这些西方人带来考察便利的同时，亦是一柄双刃剑。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义和团等政治运动的兴起^⑤，民众对于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的敌意增强，这种情况在华北尤为多见。范发迪在其书中论述：

在华旅行、打猎不可避免就会和中国人接触，对西方旅行者和猎手来说，最大的麻烦不是来自自然环境或者毒蛇猛兽，而是在于和当地人的冲突。^⑥

受义和团运动影响，19 世纪末，在华北的天津、山东一带都发生过当地民众袭击传教士的事件。^⑦同时，在谭卫道的个人经历中，也提到过“天津教案”这一事件：

(谭卫道) 途径烟台时，听说天津发生了暴动——许多传教士被杀，房屋被烧，而且这些人都是谭卫道的朋友。^⑧

19 世纪在华北，尤其是京津冀鲁一带，长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民教冲突，一方

① [美] 费丹尼：《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郭大松、崔杰华译，第 1 版，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19 页

②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 105 页

③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第 103 页

④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第 239 页

⑤ [美]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第 1 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 页

⑥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 194 页

⑦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教案与反西教》，第 4 卷，第 1 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年。

⑧ 朱昱海：《法国来华博物学家》。

面，清政府笼统地将各大教会看作大清的“仇敌”，慈禧太后认为“民心失则天下解体”^①，对于津案一事，曾国藩也说：“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②另一方面，受义和团事件及其他政治运动的影响，当地民众认为洋人会给中国带来灾祸，需要做到“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即“扶清灭洋”。

综上所述，在 19 世纪前中期，传教士身份能够让西方人在中国内地相对自由地活动，给他们在华北地区的博物学考察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便利；但随着民众反洋情绪的高涨与清末义和团等政治运动的活跃，传教士身份反而限制了他们考察活动的深入，因此，可以说西方博物学者在华北地区的科学实作是“成也传教士，败也传教士”。

五、结论

清末西方来华的博物学者在华北与华南科学实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上，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华北缺少稳定的处所，不能同当地人建立长期、有效的雇佣关系，只能通过现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其所需的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途运输限制导致的对博物学商品贸易的取舍。正因如此，那些西方人无法通过设立商业门槛等手段，对当地人做出“规训”，更无法向他们普及博物学知识，或是传授西方科学，故没有办法像范发迪所论述的华南那样，通过树立科学权威改变华北地区的博物学传统，建立起一个“知识帝国”。

同时，那些西方人 19 世纪在华北地区科学实作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教士这样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是因为传教士的身份，使得他们尽管能在华北自由行动，却常常受限于民众反抗、政治运动等外在因素，使得华北地区的博物学考察进展、深入得并不如华南地区顺利。

① 翁万戈，翁以钧：《翁同龢日记》，第 2 卷，第 1 版，上海：中西书局，2012 年，第 815 页

②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 1 版，长沙：岳麓书社，1995 年，第 1787 页

参考文献：

1. [俄] 尼·费·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金斯基传》，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2. [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3. [美] 费丹尼：《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郭大松、崔杰华译，第1版，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美]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第1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英]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6. [英] 苏柯仁著：《在中国的一个博物学的开拓者》，朱锦成译，《新科学》，1940年。
7.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8. Alex Soojung-Kim Pang, "The Social Event of the Season: Solar Eclipse Expeditions and Victorian Culture", *Isis* 84, 1993. p.252-277
9. Arthur de C. Sowerby, A. M. Sowerby, J. E. Stone. "The Sowerby Saga", Washington, 1952.
10.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Sport and Science on the Sino-Mongolian Frontier",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8.
11. Bretschneider, "History".
12. Clarke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816-1817", London: Longman and Hurst, 1818.
13. David, A., "Fox, H. M., Biographical Sketch, from 'Abbe David's Di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xv xxxii.
14. G. E. Morrison, "An Australian in China",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72, 50.
15. James Anderson, "Letters to Sir Joseph Banks, Baronet,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on the Subject of Cochineal Insects, Discovered at Madras, &c. &c." Madras: Print by Charles Ford, 1788.

16. Jane Camerini, "Remains of the Day: Early Victorians in the Field", in Lightman, ed. ,
Victorian Science in Context. p.354-377
17. Kew,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53 (87).
18. Kew, "Misc. Reports. " 4.4. China. Economic Products. II . , ff.
19. 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Chinese: Ind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 From
1853 to 1856", London: John Murray, 1856,60.
20. Vincentians, "Annal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Paris: Rue de Sevres,
1936.
21. Whittle, T., "The Plant Hunters", London: Heinemann, 1970.
22. 范丽媛, 韩琦:《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东北地区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1年第2期.第231-245页
23. 范丽媛:《20世纪上半叶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华博物学实践研究》,山西大学,2023
年.
24. 高清青:《论南北方言差异》,《汉字文化》,2022年第11期.第25-26页
25. 黄相辅:《温室、透镜与水晶宫:19世纪科学中的玻璃》,《科学月刊》,2021年
第616期.
26. 蒋宇恒:《清代英国博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科学实践背后的权力话语》,《西部学
刊》,2023年10月上半月刊.第101-106页
27. 李齐芳:《中俄关系史》,第1版,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年.
28. 刘华杰:《博物复兴与未来生态文明》,《文明》,2023年3月.第8-9页
29.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第1版,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30. 王钊:《中国古代博物学绘画》,《博物》,2017年第3期.第36-41页
31. 翁万戈,翁以钧:《翁同龢日记》,第2卷,第1版,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
32.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教案与反西教》,第4卷,第1版,台北:台湾商
务印书馆,1985年.
33. 朱昱海:《法国来华博物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4期.第102-128
页
34. 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历史学报》,1977年第5期,第281-292页